

上次去台北,一到大名鼎鼎的西门町,我便问向导附近可有当年铁路的旧迹,向导不知。我问他可知道杨唤,他懵然摇头,我又说,据说台湾中学生课本里有他的诗,还是某册的首篇,名为《夏夜》,他立刻恍然大悟状,连声说“有印象”。

那是一首儿童诗,恬静美好,亦充满童趣,极适合放在课本中。杨唤是一位诗人,未满20岁便以诗成名,却于24岁时辞世,只留下二十余首儿童诗。1980年,《布谷鸟》诗刊设立杨唤儿童诗奖,1988年,“杨唤儿童文学奖”成立,每年颁奖一次,那是惠及两岸儿童文学作家的奖项。

我之所以问及西门町的铁路故迹,是因为那是杨唤意外去世的地方。据载,1954年3月7日,有雨,他在台北路遇同事,得赠电影《安徒生传》的劳军票,而安徒生恰恰是他的偶像,若非囊中羞涩,他早已自己购票,于是,他匆匆跑向西门町电影院,穿越铁路时,竟不慎把脚夹在两条铁轨的缝隙中,而列车却随之呼啸而来……

如今站在西门町的喧闹街头,入眼只有一派繁华,不见当年风貌,更不会有关于杨唤的蛛丝马迹——即使在当年悲剧发生时,也乏人关心杨唤的命运,因为他只是个卑微潦倒的青年。他的一生实在太短暂与贫苦,1930年出生,1947年到青岛工作,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至台湾,1954年意外去世。

如今能寻得的杨唤故迹,

【故人旧居】

## 孩子也有他们的鉴赏力 儿童诗人杨唤:

□叶克飞

也许唯有他在青岛的故居。

那是我外婆家附近的青岛观海一路4号。在我印象中,这里永远是静谧的,想来是因为交通不便的缘故,因为此路环绕观海山,小路间彼此石阶相连,只有一个路口可通车,便少了喧闹。

沿石阶走上观海一路,宛若走进欧洲小镇,一栋栋德式小楼自顾自地残旧着,院子里总有茂密树丛和绚烂的花。这一带总有着一种破败的美,我少时无从察觉,可多年后,一个人站在这条街上感受这宁静,那破败便扑面袭来。路口右边的一栋平平无奇的斜顶红瓦建筑便是观海一路4号,探访那天,房顶的红瓦边沿顽强地生出一束紫色小花。

那顽强,一如杨唤本人。

杨唤一生坎坷,颠沛流离。他不满周岁母亲便病逝,两年后,对他极好的祖父母也相继去世;父亲再娶,可后母一直虐待杨唤。1947年,17岁的杨唤从农校毕业,同年父亲病故,他无法留在家中,只能四处流浪,先是到天津投奔亲戚,因寄人篱下而饱受白眼,然后前往青岛,在《青报》找了份校对工作。不久,副刊编辑因病休假,他临时顶班,却表现出色,结果成功转正。据友人回忆,杨唤认为在青岛那段时间是自己最快乐的时光,那时报社恰好补发薪水,他立刻买了两本竹箱的文学名著。他也结识了不少作家,并尝试自己写诗写文,第一本诗集《乌拉草》便在青岛结集。

可惜好景不长,当时中国兵荒马乱,他连工作都保不住,不久《青报》关门,他又流浪至厦门,迫于生计,进入一支国民党军队当电影放映兵,1949年春随军去了台湾。

在台湾,他找到了自己的梦想,1952年,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儿童诗。

我曾认为,特别幸运的人与特别不幸的人都会有纯真童心,杨唤属于后者。他早年在大陆时创作抒情诗,赴台后专注于儿童诗,前者是忧郁的表达,后者却欢畅温暖。少时的悲惨生活让他愤懑,却也让他无比憧憬甜美的童年,“我笑我那萎谢的童年,我笑我那童年里的苦难,虽然我笑得很凄然”。

他写儿童诗,友人并不支持,认为以他的才气应写

更“高级”的东西,杨唤则说:“儿童文艺在中国是最弱的一环,虽然目前儿童读物多如春笋,严格地说来又有几种合格的呢!较之英、美、日本,可谓少得可怜又可怜。我不敢说我的儿童诗写得怎么好,但是在这里就没有人肯花工夫去给孩子们写东西,你想,一般成了名或出了名的,或不成名的也不出名的都想用大块文章去换得奖金,有谁肯花大半天的力气,去换两包香烟钱呢……你知道,群众是最好的考验,孩子也有他们的鉴赏力。”

他的儿童诗,如今读来亦是优美动人,童真总被唤起。那些童年遭受的艰难困顿,似乎更激发了杨唤的爱与真挚,就如研究杨唤的学者所说,“他在长期呐喊、内心孤独的生活中,却能以丰富的情感驰骋于无涯的联想领域,用纯美语言,酿成当时特有的天真儿语,实在堪称一绝”。他的儿童诗并非只是写给孩子看,也写给自己看,那些美丽幻想,那些童话情境,都是他梦中期盼,比如故乡的“月光,银色的海,蓝色的海,美丽的美人鱼,美丽的星子,红红的灯笼,红红的珊瑚……”世间万物,都成了他诗中素材,再以拟人修辞表达,尽是童趣。

当然,也有惆怅——在他不写儿童诗的时候。比如他写《乡愁》,便是我爱的腔调,尤其是那句“站在神经错乱的街头,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”。

可惜,这个世界给他的时间委实太少。

【齐鲁英烈】

## 张晶麟: 胶东“刘胡兰”

□陶遵臣

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其实,1941年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就出现过一位刘胡兰式的少年女英雄:烈士张晶麟。张晶麟的一生仅有短短15年,但她用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。

张晶麟1926年出生于荣成县俚岛区青安屯村(现辖属寻山街道)一户贫苦农民家庭,是个可怜的遗腹女。母亲靠着耕种村北一亩薄地和给本村小学教员做饭维持生计。张晶麟10岁那年,村里办起了女子半日制学校。张晶麟被母亲送进学校,她上学非常勤奋,学习成绩优良。在学校里,老师讲起岳飞、文天祥等历史人物的爱国故事,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与恨的种子……

1938年,青安屯村张华丰兄弟3人以开小酒店作掩护,建起了党的地下联络站。因为群众基础好,村里1940年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,被称为“小苏区”。

1940年2月,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张晶麟的家乡,经常来烧杀抢掠,目睹乡亲们担惊受怕的日子,张晶麟找到村里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张之诚,强烈要求加入了村妇救会。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,她很快懂得了革命的道理,积极从事抗日宣传,站岗放哨,工作十分投入。

1941年4月初,经张之诚推荐,中共俚岛区委决定调张晶麟到峨石乡担任自卫团团部干事。张晶麟到峨石乡工作后,这里的环境十分恶劣,但她无所畏惧,总是没日没夜地走村串户,检查岗哨,组织妇女识字班,教少年儿童唱革命歌曲,不知疲倦地工作着。

横贯胶东半岛的伟德山支脉大恒山,是荣成县伟德山区、荣山区及俚岛区的制高点和交通要道。大恒山南山腰有座虎砧寺,山后则是险要的关隘杏华口,乃是威海通往俚岛的咽喉,地势十分险要。日伪军一直想利用这座古寺安设据点,以切断荣成中部各区之间以及与威海的联络。

敌人的阴谋被荣成县委及时识破。峨石乡委接到县委指示后,决定组织附近群众拆除虎砧寺。张晶麟连夜和其他几名同志分头到沟陈家、山后、桥子沟、柯家口、初家泊等村庄发动群众,约好农历七月二十七齐聚虎砧寺。

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由于汉奸告密,俚岛据点的日伪军得到拆寺的消息后,立即派来了人马,气势汹汹地包围了虎砧寺。日伪军一边喊“捉拿共产党”,一边开枪射击。听到枪声,拆寺的群众慌乱起来,四处奔跑,情况十分危急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,张晶麟沉着地对战友小黄说:“我年龄小,目标也小,你赶紧带领群众突围。”她边说边指挥群众疏散突围。最后大家安全脱险,张晶麟却落入了魔掌。

张晶麟被捕后,敌人立即将她押往俚岛据点。穿过俚岛街时,两旁挤满了人。张晶麟像一位出征的壮士一样,脸上毫无惧色。提审过程中,张晶麟被打得遍体鳞伤,几度昏厥。敌人的残暴令人发指,但是,张晶麟并没有屈服,反而更激发了她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。

张晶麟被捕后,区委、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心急如焚,多次设法营救,但皆因敌人戒备森严未能成功。

八月初一凌晨,黔驴技穷的日伪军将张晶麟押到了俚岛东烟墩山山坡上。张晶麟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,面对刽子手举起的屠刀,张晶麟高呼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这震天动地的口号,令刽子手们胆战心惊……残暴的敌人对张晶麟举起了屠刀,并凶残地将她的头颅挂在村里示众。

由于当时的胶东抗日根据地被敌占区所分割,张晶麟的事迹未能被党的新闻媒体及时宣传;新中国成立以后,张晶麟当年的战友有的牺牲,有的随部队转战到全国各地,致使这位刘胡兰式的少年女英雄的事迹被“尘封”多年。但是当地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过张晶麟,她的英雄事迹在当地口口相传,流传至今。



【老照片】

## 怀念蓬中生活

□蔡敏义

我现在住在枣庄,88岁了。因为缝了3600多双棉布鞋垫给部队官兵,大伙儿都叫我“鞋垫妈妈”。我珍藏着一张老照片,虽然有些模糊,但跟它有关的许多记忆,却是无比清晰,怎么也忘不掉。

1941年,那时的蓬中是蓬莱县唯一的中学,是八路军创办的半工半读学校,也是我们这些青年人想参加八路军的桥梁。

学校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里,老师和同学都分散住在老乡家,我和几位同学住在一个有钱人家的粮库里。大家上山开荒种菜,因为是石头地,种的小白菜只长几个叶,主食是苞米饼子,还有地瓜干。生活虽然艰苦,但同学们每天有序地听课、唱歌、排练节目,《南泥湾》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学的,我们排练的节目就有庆祝孟良崮战役大捷的。

有一次学校安排我去二刘家学校开会,我认识了八路军派到村里工作的刘进同志,他送给我几本八路军印的宣传小册子,还有一本论联合政府的书,那时我就梦想着去当八路军。有一次听过团课后,团组织委员找我谈话,问我想不想入党,我说,愿意。他又问我入党想干什么,我干脆地回答,去当八路军。他说是为人民服务。真好,这句话真好,当八路军就是为人民服务。

1947年7月,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,学校被迫暂时疏散,10月份南迁至四十里外的四甲复课,我们一晚上走了四十多里路,大家搬抬、扛、提,到了四甲时,天已经蒙蒙亮。女生集体住在一个临街的房子里,地上铺着麦草,中间放一根木头,大家头对头睡,每个宿舍发一盏豆油灯,每天早晨起床后都从井里提水洗脸,因为是冬天,女生们洗完脸后,脸两旁的头发都冻成了小冰棍。

战争年代,天有不测风云,上级又通知学校停办,我当八路军的梦想要落空了,我哭了两天,学校老师告诉我,有机会一定通知你。1948年3月份,学校通知我和顾云芳(女)等准备去抗大,然后我就在村里参加民兵训练,学习埋地雷,地雷有板雷、钉子雷、管雷和绊雷等。到了5月份,我和同学顾云芳、蔡斌、金德生终于一起去参军了。(图片摄于1948年9月青州,从左至右顾云芳、作者、蔡斌)

【旧时光】

## 高粱、水稻与红麻

□山歌

夏日能使记忆的闸门洞开,从浸出的汗液里,透出童年、少年与那几种与生命相关联的植物来。

老家最早喜种高粱,春种秋收,红红的高粱米,可烙煎饼、蒸馒头、蒸酒。在狭长的圩田内,粼粼的湖面上,时时能听到渔家“吱吱”地摇桨声。瓜田李下,柳树蝉鸣,太阳底下的瓜农,不失时机地翻晒着西瓜的另一面。成熟的高粱被大人砍回家,忙着给嗷嗷待哺的孩儿饕餮一顿。高粱穗壳去掉颗粒,可以扎扫把、笤帚;秸叶可喂牲口。很多时候大人收获要在水里进行,夏末秋初雨水多,涉水砍高粱的事再正常不过了。

后来大面积种植玉米,其间也试种过水稻,都是为

浇方圆五里地。畦田一放水,生产队长一阵叫喊,村里男女老少齐上阵,大人插秧,少年撂秧苗。这时,微微南风拂动,社员们的心坎,新鲜有趣的活儿,大家努力地把稻苗插好。本族衍好叔和我是初中同学,麦假期间俺俩头一次跟着大人学干活。下午一两点钟,送饭的从七八里远的队部,肩挑茶水和饭赶来。“生产队管吃”,这对于习惯每天二顿饭的村民来说,是极好的事情。有人提出分给大人三张饼,少年则一张。当时我不知怎地暗自掉泪,力没少出,饭比大人少一倍多,心里颇不平衡。衍好叔对我说:“道民,咱家走,不干了!”

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,名句到了江北就没

了质感,几次栽种的水稻都因土壤漏水,产量低,再也不种了。

本地种植红麻的历史不算长,但是它棵高、浓密且粗壮。处暑正是收获季节,生产队把收割过的红麻放到河边或大坑中沤泡,到立冬前后捞上来,剥开晒干能拧绳。牲口拉车、东西捆绑都离不开绳子。但是沤红麻得用许多烂泥覆盖上面,或者用石头压住,好让它泡在水里。相比种植历史悠久的苎麻、苘麻,从国外引进的红麻既高产又适宜,一时间种植红麻如火如荼。社员和学生们一起劳动,收割红麻的场面不亚于集体收小麦。

如今高粱、水稻、红麻,在我们老家都很少见了。